

“神州国光社”后半部史略

前 言

神州国光社在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创办于上海。最初的主办人为邓实（秋枚）、黄节（晦闻），均为广东顺德人。后来画家黄宾虹（安徽歙县人）参加，历任编辑有年。该社的早期历史见于蔡元培作序、该社出版的《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序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及其季世，邓秋枚先生、黄升中先生、黄晦闻先生始应行《国学丛书》，举蕴蕴已久之书，拂拭而流布之。其机关则以印行《神州国光集》之故，而最后定名为神州国光社，以至于今。”由此可见，“神州”诞生之前，还有它的一段历史。应当说，在邓秋枚、黄晦闻等人创办《国学丛刊》、《国粹学报》时代，属于“神州”的史前。

邓秋枚等人在提倡国学、保存国粹的具体活动中，实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民族革命思想，他们又都参加南社，并与光复会有密切联系。他们对于明末遗老的民族大节，备极推崇。印行有黄梨洲、颢亭林、屈翁山等人的著作多种。同时又利用当时最新的印刷技术——珂罗版（日本传来），影印历代遗留下来的书画真迹，印行书画册，其中以画册为最多。画册中有《宋画山水集锦》、《黄子久山水长卷》、《董玄宰山水册》、《沈石田吴中奇境卷》、《恽南田山水册》、《仇十洲人物册》、《戴鹰阿山水册》、《新罗山人百兽图》、《傅青主山水册》、《王时敏仿古山水册》、《大涤子宋元吟韵》、《大涤子乾净斋倡合诗话册》、《大涤子众爵齐鸣图手卷》等好几百种。还有《神州国光集》十二册，系丛集唐、宋、元、明历代珍本，最为国画界所珍视，后又续出《神州大观》十二册，流传亦广。同时还影印有《晋魏写经墨迹》、《唐人写经》以及《李翁西狭颂》、《郾阁颂》、《熹平石经》和《宋拓定武兰亭序》、《旧拓瘞鹤铭》、《旧拓岳麓山碑》等碑帖。还有拓片、印谱之类的美术品多种。此外还出版书籍甚多，如黄梨洲的《雷塘余集》、钱谦益的《投笔记》、吴伟业的《吴梅邨文集》等达数百种。此外还有孙贻公编的《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而以《美术丛书》一书，堪称巨著，全书分四集，共一百六十册，为黄宾虹与邓秋枚合编。该书丛集古代美术家著述，内容分五类，有书画类，雕刻摹印类（附纸、笔、墨、砚文房品）磁铜玉石类，文艺类（附词、曲、传奇），杂记类。该书以书画为主，尤以画为最多，因当时“神州”以印行画册为主的原故。该书最大特点，即亦搜集者多为“行世久远，旧板散失者；有收藏家仅有传钞，而无刻板者；有前哲脱稿，而未流行者；……若大部通行之本，概不收入”（详该书《略例》）。而“《神州国光集》、《神州大观》悉古人之真迹，是书悉古人之精神”（详同上）。可见该书在“神州”出版物中所占的地位。到现在该书仍不失其为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丛书。

自清代末年至民国初年，是“神州”前半部史的黄金时代。迨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给予“保守派”、“复古派”以沉重的打击，因“神州”出版物侧重在美术方面，故尚未受到运动的直接冲击，但美术毕竟是上层建筑之一，不能不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同时，一方面由于当时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斗争，产生了全盘否定

的倾向，另一方面，则由于买办文人的膜拜西洋“文明”，因此汇成了一股对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的逆流。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神州”的业务发展。后来经历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随着蒋介石的叛变，革命转入低潮，加以连年的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商凋敝，知识分子则生活极度不安，思想动荡，真是“群相救死之不暇”，谁还有心情来欣赏这古典艺术品呢？至此，“神州”出版物大量滞销，业务一蹶不振，终于不得不走“招盘”一途。

以上概述了“神州”前半部史——三十年的经历，及其出版物概况。

接办“神州”前后

我于一九三〇年接办神州国光社。其时，我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已调到北方，参加蒋、冯、阎中原混战，并在济南正式改编为十九路军。因历史关系，我与该路军仍血肉相连，休戚与共，故始终一致。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内部不断发生新的矛盾，而十九路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随着产生加剧。我正于此时接办“神州”，当然与此有密切联系。同时因我担任广东省政，与各方面的接触较为广泛，且有条件接办像“神州”这样规模的企业。在接办时虽然由我个人投资，但它始终是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的。

就我个人来说，一向爱好文学艺术，且喜欢同文人来往（早期所接触者多士大夫类型的旧式文人）如在粤军时，就经常请“名流学者”到军中讲演。自任南京总政治部副主任后（吴稚晖为挂名主任），才开始接触一些具有现代知识的朋友，其中与何公敢（总政治部宣传处长，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欧阳予倩、王礼锡（均同在宣传处工作）等人，交谊最深。到后来，从接办“神州”起到福建人民政府阶段，则以王礼锡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

我在广东时，除聘何公敢为省府顾问外，并聘光升（北洋政府孙洪伊内阁的秘书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当时我的对外文电，大都是他的手笔）、江彤侯（桐城派古文家）、彭一湖等人为顾问，并以黄晦闻为教育厅长。同时还邀请欧阳予倩回粤，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不久即著成效。接着我又向香港、澳门侨商募集股款二百万元，筹办民营广东大戏院，预定我任院长，予倩任副院长。股款已全部入手，地皮亦已划定，正在开工修建中，广东发生了“政变”（即“宁粤分裂”），我离职北上前，只得将收到股款退还，宣告停办。一九三二年我第一次到欧洲，予倩一人陪同前往。他在出国前，曾参加过“神州”的编辑工作，写有《自我演戏以来》一书，并以戏剧研究社名义编辑《戏剧论文集》多种。在出国期中，他写有不少游记之类的作品，叙述他同我在海外活动的片断，部分发表在“神州”的定期刊物中。后来他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

我接办“神州”时，王礼锡向我建议说：“这个书店应当帮助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的作家），为他们提供一个写作的园地。”其时我因不满现状，亟欲另开政治局面，同时也意识到文化事业对政治的作用，故欣然接受了。其实，我当时对于左翼作家的政治路线和

文艺方针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论战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清楚，仅对“左翼”的涵义有点抽象的理解罢了。甚至把党内的右派也认为是左翼，故后来“神州”出版物中出现了不少马列主义的赝品。

当我的朋友黄居素（其时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与黄宾虹协议好要我接办“神州”时，我一次付出四十万元。黄是最早主张我接办“神州”的人，但他对书店的出版方向，并不明确，即：还是照旧印行画册为主呢？还是改弦更张，印行别的读物呢？而印行别的读物又应以什么为中心呢？凡此种种，他没有考虑。我自己也没有详细计划。其时王礼锡与陆晶清还在日本度蜜月。同年秋，我到日本旅行，在东京与王晤面，他进一步提出建议，即接办后的“神州”须要翻译共产主义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从经济上来支援作家。我完全接受了。

接办“神州”时的两个主要人物

黄居素、王礼锡是我接办“神州”的两个主要人物，他们都同我有相当长的历史关系，在我以往的政治生活中，和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但他们两人的政治见解不同，作风迥异。在此我把他们的简历写出来，着重在与我有联系的方面。

黄居素，广东中山县人。他早年任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秘书，由我的同学章达介绍与我结识。在我一生经历中，许多问题都与他有联系。我们相互间私交虽好，但在重要政治问题上，特别是在紧要关头，他往往与我背道而驰，各行其是。他惯于作幕后策划人，因不是当事人，故其策划多近于下赌注，不计后果。他同我策划的事，多被我断然拒绝了，但在一些问题上，仍不免受其牵连。我拒绝过他的策划有：一九二二年陈炯明被孙中山先生免职后，抗不奉命，竟将军队带走“退保东江”。陈还委派黄居素来我军中游说，携有毫洋两千元（由造币厂长钟景棠处拨用），企图收买，要我把军队带着跟陈一起开往东江（时我任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黄这种策划为我拒绝了。又如一九二七年我任武汉卫戍司令时，黄又来包围我，并献策要我利用军权，对国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包括俄顾问在内）实行所谓“兵谏”，也被我断然拒绝了。（事后我到南昌见蒋介石时，廖夫人亦在座，我谈及此事，蒋亦连说：“不可”。）一九三二年我第一次游欧时，所遗交通部长职务（实际我已辞职，但未获准），照例由政务次长陈孚木代理。黄趁我出国期间，与陈策划，利用职权，在签署马凯电信合同及变卖招商局产业时，收受重贿，引起轩然大波，给蒋介石后来在政治上攻击我的口实。黄也曾同我一起作过一些引人触目的事。如一九二四年我由南京重返粤军时，我们在香港策动陈炯明机关报《新闻报》主编陈秋霖（后来与廖仲恺先生同时被刺）举行“报变”，即利用原报纸发表“弃陈投孙”社论，取得成功。事后广东革命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此有很好评价，汪精卫恭维备至地说：“这次‘报变’获得成功，甚于十万之师。”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龙云在香港发表致李宗仁、何应钦的电文，是黄执笔的，中有“签一为民族万世开太平之约，以伪法统获真和平，此所谓化腐朽为神奇，其为大勋，千秋之后，应有定论。”这是他自以为得意之笔。

我接办“神州”初期，黄任经理，以后连继几任经理，都是他一手安排进来的。我对“神州”的经济情况，从未过问。事后有种种传说，说黄对“神州”经济上有问题，我未介意。不过据当时参加工作的人说，“神州”接收时，只有小型印刷厂一所，以及一些滞销的书画册和珂罗版若干箱，此外并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接办不久，流转资金即感不足，曾由作过云南航空队长继任十九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刘毅夫，打电报给龙云，由龙资助了五万元。后来又有在十九路军作过军需的杨建平，在我第一次出国时，假借“神州”需款的名义，向蒋光鼐骗过一笔钱（时蒋任福建省主席），至他卷款逃往海外后，我们才发现此事。

最初阶段，“神州”的经营管理，全由黄居素负责，外面很少人知道是我投资办的。后来因出了大量左倾的社会科学书籍，逐渐引起了一些国民党中央大员的注意，并加以种种揣测。其中有些人，知道黄是我的朋友，常向我试探。如胡汉民，林森都对我说过：“居素办神州国光社，是受共产党骗了。”我仅一笑置之，未予答复。黄对“神州”并没有长远打算，不久他就回广东，当中山实验县的县长去了。其时，他曾利用职权上的便利，帮助过一些进步人士，如现任国务院参事的陈公培逃到中山县时，由他掩护了一段时期。在福建人民政府之前，在政治上他同我已分道扬镳，他还在香港报纸上发表过文章，以尖刻的语言说我们是“闽”中之“虫”，引起十九路军全体对他的反感。

王礼锡，江西福安人，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他在其祖父长期教养下，对古典文学有一定基础，喜作旧体诗，对唐代诗人李义山、李长吉的作品作过一番研究。他在学生时代编的刊物为《绿波》，以后搞“农民运动”时编的刊物为《血汗》，他又与段锡朋、刘林模等人合编过《青年呼声》、《新时代》等刊物。我以前对他的早期活动是不清楚的，现以撰写本文，不能不涉及他的生平。由于他的思想变化幅度较大，需从他主编“神州”的书刊中，找出他政治倾向的实质，而对他早期历史的了解，也极为重要。但我手边占有资料不多，仅有他死前两个月赠我的《缙云山与真如夜话》的五言诗（长达八十韵），以及我在他死后数日写的悼念文章《寄托死者一封信》中，曾概述其生平及彼此结交始末，可作线索，但亦嫌略而不详。

他的诗中开始有：

平生数交游，与子为最奇，
但记一面熟，不忆始何时？
一日我倦觉，遇子沪之湄。
子言我有兵，由赣且趋闽。
何不入我军，我姑东适夷；
不久即归来，与子同心期。

在我的《寄给死者一封信》中有：

“你致力于国民革命工作，莘莘大举者，于江西作学生时代，于南京总政治部，于平津国民党部，于十一军，于十九路军等处，而当中表现最强的为：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军队政治运动

和党务传与组织等工作。”

最近于无意中发 现他自己写的《王礼锡自传》，中有许多是我过去所不知道的，兹摘录数则如下：

一九二三年以后，始从事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与毛泽东，陈克文等在武汉筹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因意见不合而离开武汉。一九二七年特别委员会成立，我对整个局面失望。以后随十一军入闽，曾回上海办报，曾在南国艺术学院教书。一九二九年到北平办学校，与学生百余人从事为工人本身利益而组织的工人运动，北平，平绥，平汉各路，塘山矿，塘沽各工厂的工人自己的工会先后成立；后以受打击南回。南回后，决心从事理论研究。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为了确立革命的理论起见，在所编的《读书杂志》中，倡“中国社会史论战”，使一切有党派，无党派的意见，皆得与社会相见，任读者自由抉择。有对于理论的公开讨论感到不便者，诬我组社会民主党，实则我还在学习也。

从以上材料看来，王礼锡以往的经历，并非我平素所想像的那样简单。过去我仅以为他因不满于蒋介石的专横，故脱离国民党，逐渐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我从不知道，他在国民党改组时，已开始从事所谓“农民运动”，并在大革命时，还同毛主席一起筹备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近据友人谈，陈克文确有其人，是广东人，属于汪精卫的改组派。其对汪在武汉政府当权，陈有机会参加是可能的。而王是怎样参加进去又怎样脱离的呢？至今还弄不清楚。现在要问：王在当时参加的农民运动，究竟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语）事实很明显，他当时的活动，肯定不是第二类便是第三类。他在此后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发展，当不难在他主编“神州”的书刊中和他后来的具体活动中得到解答。

以下叙述我同他结交的始末。

一九二七年，我在南京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时，王礼锡在宣传处工作，是由他的同乡段锡朋（任组织处长）引进来的。开始同我并无接触。后来总政治部结束，我将到日本时，在上海与他晤谈，乍见之下，便为他的言论丰采倾倒；由于思想气味相投，大家从此便成莫逆之交。其时，蔡廷锴正率第十师由江西开入福建，且将在福州恢复十一军，我已决定回军主持。我曾嘱王先行随军入闽，俟我短期从日本回来，再作打算。使我印象最深的，那次晤面对他就向我坦率表示，他已脱离“AB团”（以段锡朋为首的反共小集团），并同段断绝了一切政治上的联系，以示同我合作到底的决心。据我所知，他此后确未与段有过什么联系。他随十一军入闽，曾在军中担任秘书，办理文牘之类的工作，不久便离开了。

后来，他到过北平，我仅知他与小鹿（陆晶清）结识，并发生了爱情。以后他又同小鹿到日本去了。在“宁粤分裂”后不久，我到日本游历，在东京同他晤面，共同商讨了“神州”的计划，并确定了新的出版方针。他立即组织“班底”，并带着一批人回上海主持“神州”的编务。我回南京后，曾到江西担任“剿共”军职，到上海时，曾与他密谈过关于十九路军与蔡元培、邓演达策动反蒋军事政变一事，并要他前去参加，他因舍不得“神州”

事业未去。他在《缙云山与真如夜话》一诗中，有：

京沪偶一来，下问多要议。
竟欲割东江，久贱非所计。
何不遂投笔，一行且作吏。
但我在神州，积习误文字。
物观校丛书，读书编杂志。
雀卵虽纤微，母雀覆以翅，
蛛网涂秽壁，小虫身所寄。

王到“神州”后，即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担负起主编职务，并“招兵买马”，聚积了他在北平、上海、日本结识的许多朋友，来“神州”担任具体工作，并罗致了上海各方面文化人士，担任特约编辑。当王礼锡在“神州”的《读书杂志》提出“中国社会史论战”后，“神州”因此由一个暮气沉沉的古老书店，一变而为一个声势浩大的新书店，在当时上海出版界中，确算一个创举。王在“神州”时间，实际并不算长（只有两年多），但在这一阶段，确是“神州”后半部史有声色的时代。

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时，王礼锡最为活跃。他受各方面的攻击时，从其所持观点出发，作过答复，也发过牢骚。当我第一次到欧洲时，他不久也带着小鹿到了伦敦。我们一起游历了欧洲各国，并一同参加过一些国际政治活动，他还参加过国际作家组织的各种集会。我们都受到当时在欧洲酝酿着的“人民阵线”的思潮影响。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王礼锡回来参加了各种活动，并在我直接负责的文化委员会任秘书长。他工作积极，对我的帮助甚多。不久失败后，他再度游欧，长期居住伦敦，除了写作之外（靠卖文为生），并积极参加国际反侵略运动。一九三五年我第二次游欧时，他已在国际文坛上显露头角，“雪莱王”（译音，他的笔名）的声名，响亮一时。他当时所交游者，大多为第一流作家，以及各国在野党的政治活动家。他曾同我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参加“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我被推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团员有王礼锡、陶行知、钱俊瑞、胡秋原、陆瑾（女）等九人。接着他又同我一起访问莫斯科。此后他又参加过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农民和平大会”，以及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特别大会”。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外做了许多抗日宣传工作，于一九三九年回国。他到重庆后不久，即接受了国民党党政委员会的委托，到华北战区作战地文化工作。行前“抗敌文艺协会”（为党领下的进步组织）派了十五个青年随他到前线搜集抗敌文艺材料，他接受了，并把自己一次领到半年的差旅费平均分给大家使用，组成“作家战地访问团”，轻装出发。他行前曾访问我并作诗话别，还留下他伦敦写的手稿《去国吟》交我保存。他在渡黄河时，在其致薛农山的信中有：“我毋渡河，我竟渡河，渡河不死，将奈我何？！”此岂非预示着他的死之将至吗？他在越太行山途中，便患了重病，不得已折返洛阳，病死在旅舍。其时驻防洛阳的卫立煌将军，与王素昧平生，因尊重其人，慨然出资将其遗体安葬于历史上有名的“北邙山”之麓，与东面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墓遥相对峙。卫知王与我的交谊，故于

葬后即以电报告我。解放后，卫初到北京时，彼此相见即谈此事。一九五九年，我到洛阳参观时，曾抽暇往吊其墓，虽墓木已拱，但碑碣犹存。

“神州”出版物一斑

“神州”出版物可分为两大类：一为书籍，一为定期刊物。书籍的内容则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占比重最小。旧“神州”的传统出版物，如书画册与古典文学艺术等书籍，仍保留下来，但印行数量不大，仍由黄宾虹编辑。书籍方面总的分类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字艺术、历史、哲学、中学教科书、儿童读物、自然科学、活页文选等等。

在社会科学方面，有关共产主义经典著作者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傅东华译）。还有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汪馥泉译）、《唯物史观》（梅龚彬、徐翔合译）。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主义》（杜畏之译）。德波林的《斯宾洛莎与唯物主义》（杨东莼译）波卡洛夫的《唯物史观的世界史》（方天白译）。河上肇的《通俗剩余价值论》。石川准十郎的《资本论概要》（钟鼓熙译）。高昌素之的《资本论大纲》（施复亮译）等等。此外还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纲要》（严灵峰译）、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等书籍。

在文艺理论方面，出了大批有美学的书籍，而以《物观美术丛书》集其大成，中有：《康德、席勒之美学及其批评》（冯雪峰译）、《黑格尔之美学》（胡秋原译）、《梅林之美学》、《卢那卡夫斯基之美学》（陈望道译）、《普列汉诺夫之美学》（贺费陀译）。还有《艺术理论丛书》多种，中有《泰纳：艺术哲学》（沈起予译）、《居友：社会上所见的艺术》（穆木天译）、《格罗达：艺术之起源》、《霍斯善坦因：造型艺术社会学》（陈望道译）、《别林斯基：文艺论集》、《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艺论集》（贺费陀译）、《梅林文艺史论集》（冯雪峰译）、《梅林：莱辛传说》（胡秋原译）。还有鲁迅主编的《现代文艺丛书》中有：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侍桁译）、卢那卡夫斯基的《浮士德与城》（柔石译）、高尔基的《没落》（程小航译）、芥川龙之介的《败北》（沈瑞先译）、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贺费陀译），等等。

此外，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则有：王易的《国学概论》、《修辞学通论》、《词曲史》、《乐府通论》，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汪辟疆的《唐人小说》、李华的《宋人小说》，唐圭璋、朱古微的《宋词三百首笺》，王礼锡的《李长吉传》、陆晶清的《唐代女诗人》。此外，还有《创作丛刊》，有沈从文、林疑今、王统照、张申府、张衣萍、庐隐（女）、彭芳草等人的作品多种。并有由王礼锡等人合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出了好几十种。还有由神州函授学会主编的《三角丛书》，是一种通俗读物。神州函授学会是“神州”与青年读者建立联系的组织形式，曾活跃一时，兹将该会组织名单介绍出来：

会长：王礼锡

教务主任：徐翔

国文科主任：陆晶清

国际经济政治科主任：彭芳草

日文科主任：方天白

文艺科主任：胡秋原

教授：王礼锡、陆晶清、胡秋原、陈望道、谢六逸、陶希圣、蔡若暉、汪辟疆、宗白华、钱君匋、彭芳草、孙福熙、孙俚工、张资平、张栗原、梅龚彬、漆琪生、朱雪影、玉亚南、庐隐、王易、顾颉刚、胡雪、徐翔、赵达君、陈子展、林国强、费陀、伍蠡甫、孙寒冰、李长、张衣萍、徐英、方天白、李季、欧阳予倩

这些人多是“神州”的基本队伍，一部分为特约编辑。“神州”除了印行上述各方面读物外，还出版了各种定期刊物，其中以《读书杂志》的分量最大（每期有四十万字以上），发行时期也较长（从一九三一年六月至一九三三年九月），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也最大。这个刊物，在开始一段时间由王礼锡、陆晶清合编。一九三二年王出国后，改由胡秋原主编。到最末一期（一九三三年九月）胡曾宣告《读书杂志》脱离“神州”体系，而以“读卖书店”名义发行，发行人为金襄七，主编仍为胡秋原，经过情形不详。不久即停刊。

这个杂志出版时，编者（王礼锡）在创刊号上写了《给读者的一个告白》，中有：

我们主观地不标榜一个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的经活学说，一般地忠实介绍。革命文学作家的作品和趣味文学作家的作品，一样登载。我们这里的文字不统一于一个主张之下。我们尽管有思想的斗争，但编者并不偏袒斗争的那一方面以定取舍。因为我们不是宣传主张的刊物，而是介绍主张的刊物。我们这里不树立一个目标，而是为读者提供出已走过、正在走着，或者想走去的许多途径。

《读书杂志》在内容上，开始时分为以下三类：（一）讨论读书门径；（二）发表读者心得；（三）沟通海内外各方面读者的个人和团体的联络。这个杂志在出版初期，基本上是按照编者所表示的态度来组织稿件的。创刊号的总目分类为：读书方法、哲学论文、新心理学、经济学、中国社会性质讨论、国际关系、书籍批判及介绍，读书回音，等等。在创刊号发表文章的有王礼锡，杨东莼、胡秋原、张竞生，王亚南、周谷城等人。至四、五期合刊，出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特辑》以后，销路逐月激增，至一九三二年底，订数达到二万册，各地分销处均感到分配数过少，要求增加。从创刊号起，每期都有再版，这是当时出版界中少有的现象。

“神州”还以“神州读书会”的名义出版，《读书与出版》该书是以一般中学生为对象，内容与《读书杂志》相同，只是文字比较通俗，体裁比较精悍而已。该刊出版后不久即行停刊。抗战时，邹韬奋主编的《读书与出版》，名称形式相同，但是没有渊源的。此外“神州”还出版有《意识形态月刊》、《微音月刊》、《文化评论》、《文化杂志》等刊物，大部分都是由胡秋原主编的。另外，“神州”还代“苏俄评论社”印行过《苏俄评论》，第二期该社编辑部迁到南京后，便与“神州”无任何关系了。

“中国社会史论战”是《读书杂志》出版期中，最为突出的政治思想论战，它反映了

当时各政治派别与思想界的动态，同时也反映了“神州”本身的倾向，由此也可以看出它后来必然要走的道路。故此我把“中国社会史论战”作为专题，着重地把它的重要材料揭示出来，藉作史学家参考之一助。

“中国社会史论战”

“中国社会史论战”是《读书杂志》出版期中规模较大、而又引起各方面注意的事件。此外也还有其他问题的论战，如在哲学论战中，有胡秋原的《贫困的哲学》，标榜着对“胡适的方法论的批评”（发表在创刊号上），以及彭述之的《评胡适的实验主义与改良主义》，也打着胡适的《中国到那里去？》的旗号。在文艺论战中有：钱杏邨的《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以及胡秋原的关于《文艺自由的反动性》文章多篇。

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中，已有“中国社会性质之讨论”一项，其中有朱其华，陶希圣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来往信函，已预示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前奏，而开第一炮的则是朱伯康的《中国社会的分析》一文。这篇文章的作者，很明显是站在国民党立场的，他在该文的结论中有：“对革命责任是谁来领导呢？不消说是有革命责任的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特辑》出版以前，王礼锡以编者名义发出声明说，这个特辑“可以说是一个挑战的专号，对各方面的文章都有，而挑战的对象有下列人物：顾孟余、陶希圣、梅思平、陈独秀、郭沫若”。

后来，上列诸人除陶希圣外，均未参加论战。编者为什么要指名向他们几人挑战呢？现在看来，可能他认为这几人是左、中、右各派的理论权威，并且是有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性人物。同时，向权威挑战，可以提高杂志本身身价，这是当时出版界常有的做法。编者在创刊时曾强调说：“我们办的刊物，不是一个思想所占领的，也不拒绝哪个思想，我们要打破文化界‘帮口’，的独占，要反抗文学的任何倾向，任何派别以及一切无‘帮口’的个人，我们这里把仅有的篇幅献给他们。读者你们要选择哪个思想呢？要他迫着你走哪一条路呢？如你们不要自己选择，如你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思想的正面与反面，这个杂志对你们是无益的。”这是编者一开始就提出挑战对象的思想基础。显然王礼锡当时是想通过论战，在不同的主张中建立自己的主张。

编者在预告中提出的问题有：

- 一、中国封建社会是不是在春秋时已经崩溃？
- 二、士大夫阶级是不是应当重视？
- 三、殷周时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
- 四、现在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

编者提出问题以后还说：“至于结论如何，我们暂且不管，我们要的是打出来的结论，我们不要主观的图谱式的结论。我们希望能更广大的研究者普遍地研究，参加这个论战。”

“中国社会史论战”一共经过了两年，先后出了四辑，每一辑都有王礼锡写的文章。尽管他标榜着“不偏不倚”的口号，但他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感情，仍很明显地可以看出。

兹摘录他在第一辑中写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的数则，来说明问题。

“中国经济问题，现在已经逼着任何阶级学者给予答复，任何阶级学者为着要确定他们自己阶级的前途或者为之辩护，也非解答这个问题不可。……所争论的主要是如下几个问题：

一、中国现在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二、经过一九二七年的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究竟是资本主义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国民党对于这个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辩。在《前进》与《新生命》上，很早就发表过陶希圣、梅思平诸人的意见。

“九月三日《申报》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专篇的评论，……其实这表现于问题的严重化与普遍化，使布尔乔亚代表的报纸，也感到问题的重要，它并且向‘中国经济学社’提出下面六个问题：

一、世界资本主义之现状及其前途

二、资本主义之整个性

三、中国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之地位及其关系

四、中国经济的变迁与现状

五、中国经济之特质

六、“中国往何处去”

“为什么要理解中国经济的特质呢？要找出中国社会的前途，就是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可以在中国社会的前途的总问题中，随便检出几个问题来考察：

一、中国革命的高潮是否到来？

二、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本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三、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否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

要解答第一个问题，就得了解革命的条件是否具备？

要解答第二个问题，就得了解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抑是资本主义社会？

要解答第三个问题，就得了解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生的作用，与封建社会是不是存在？……

于是中国社会史问题，遂逼着各党派的学者为着它们以斗争的姿态在思想战场上出现。”

当时，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公开的托洛茨基分子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外，还有隐蔽托派身分的人，如署名“任曙”其人也参加论战。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特辑》前后四期中，除了王礼锡、胡秋原、朱伯康、王亚南、周谷城等人外，则以陶希圣和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写的文章最多。这些人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如陶希圣代表的改组派，在汪精卫未同蒋介石正式合流以前，它是以改良主义的面貌出现的。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说过：

“同时资产阶级在同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颜大的改良主义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这个派别在当时还是蒋介石政权的在野反对派，他们也采用了一些“左”的名词和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用来装点门面，欺骗群众。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都是从共产党蜕变出来的，本是无产阶级的叛

徒，但仍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故在争论中，谁都自认为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武器的，正如王礼锡所说：“虽然现在站在各方面的观点，也就是阶级的观点，来讨论中国社会形式的历史发展的问题，谁都是自以为所用的武器是唯物的辩证法，这仅仅是在认识唯物论辩证法的价值上已经较从前的争论——像人生观论战——公然以玄学的唯心方法来标榜时进了一步，但并不是谁都把握了唯物辩证法。”他这一论断，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总之，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在当时的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仅各政治派别之间存在有显著的分歧，就是同一派别的每一个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在右倾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派内部也各持所见，互有争论，大家都试图以唯物辩证法来击败论敌。这一事实表明了，当时政局的动荡不安，人们思想的浮动，但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知识界中已被公认为是一个科学的真理。除了极端反动的顽固派外，还没有人敢公然触其锋芒。这是时代的大进步。至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并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指导革命斗争，王礼锡在当时是无法理解的。因为这里还存在有极其重要的政治立场问题，及认识上的问题。

“神州”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关系

福建人民政府的产生，是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继续，但它却以那种形式出现，不能不谈到“神州”与它的关系。在此我先谈点与此有关的经历片断。

十九路军由江西开到京沪担任卫戍，原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形成的客观条件所促成的。军队开到京沪后，分散驻在铁路沿线，摆成一字长蛇阵，处处都受着蒋介石预先布置在铁路两侧重兵的威胁，处境是极为困难的。记得当时我到上海，在蒋光鼐家与蒋、蔡等会商，大家共同决定，抽调一部分官兵，组织抗日义勇军，请求政府准予北上援马（占山），由蔡廷锴发出通电，电文是王礼锡起草的。自“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十九路军受到了全国各界的同情和支持，虽然改变了原来的局面，但由此益加受到蒋的嫉恨，简直成了他的眼中钉。自“停战协定”签字后，蒋想尽种种办法，要把十九路军调离京沪。他开始想把十九路军管辖的三个师，分别调到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名为倚重，实图瓜分。事为蔡廷锴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以后才改调到福建。蒋这一着是毒辣的，他以为十九路军在江西同红军打过死仗，现调它到福建“绥靖”，蒋正好坐山观虎斗，并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其时，十九路军也有自己的打算，即到福建后，一方面可以同两广打成一片，争取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反蒋；一方面也可以创造条件，争取同红军合作，共同抗日。同年四月中华工农政府发表的《对日战争宣言》，给予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当汪精卫将要到南京去当行政院长时，我在上海去看他，曾向他吐露过：“蒋介石是靠不住的，他绝不会相信你。我们必须拆他的台，另开局面。你还是回南方去与胡展堂先生合作为好。”他听了我的话以后，仅虚与委蛇地应付一番，没有恳切表示。事后知道，他到南京后，立将我的话向蒋密告。使蒋得以从容布置，对那些曾与我有联系的人，施加恫吓。我在出国前，曾与欧阳予倩约定结伴同行，有一天我到予倩家访问，知道他的邻居就是他的姐夫唐

有壬，唐正是汪的心腹。我与予倩谈话时，偶尔涉及唐的为人，他正色地说：“唐有壬这种人同汪精卫一样，到了紧急关头，不仅可以出卖朋友，而且可以出卖国家民族。”他那种正义凛然，大义灭亲的精神，使我深深感动，从此使我对他更加敬重。

“神州”印行的大量书刊，对于我们一向读线装书的人，特别感到新鲜，并且开拓了眼界，使我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由于自己政治立场的限制，当然钻不进去，只在皮面上摸一摸，当然不可能掌握这无产阶级的武器。加以当时正是共产国际第二次大论战时期，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潮也在中国泛滥起来。我们不仅不能鉴别香花毒草，由于阶级本能的反射作用，反而对那些马克思主义赝品也加以赞赏。《读书杂志》发起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一方面反映了庞杂的时代思潮的动荡，一方面也触及到人们最关心的中国社会问题的焦点，故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注意，同时也形成了我们对于中国前途的自以为是的一套看法。一九三二年秋，我与予倩同游欧洲时，曾于印度洋舟次为《十九路军淞沪血战史》写过一篇序言，其中要点如下：

一、我们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无论从半殖民地把民族资本解放出来，或者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

二、我们认为三民主义不是以它的静止的内容来领导革命，而是以它的逐渐前进来适应革命的需要。

三、我们认为必须在民族利益上谋统一，即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

四、我们认为在经济上要有统一的组织，要以国家的统制，有计划的来发展社会化生产，并实现“耕者有其田”。

五、我们认为反对帝国主义需要民众起来，组织民众，武装民众，这样可以使军阀战争不可能延续，并且保障民众的反帝政权。

总之，我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最凶残的相貌暴露以后，应当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作为目前唯一的任务，组织并武装反帝民众作为斗争的主体，以统一的政权，统制的经济作为斗争的准备和手段。

由此可见，我们当时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是鲜明的，抗日是坚决的，对于反对封建主义，仅重新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以后十九路军在闽西搞过一些计口授田的工作，都是改良主义的一套作法，与共产党在苏区进行的土地改革不同）。

“神州”从黑暗走到黎明

“神州”在盛极时，总发行所设在上海书店中心区的河南路，印刷所在新闸路福康里，编辑部设在法租界亚尔培路，并在河南路设有存书栈房一所。设在外地的分发行所有：北平分发行所（设宣内大街），广州分发行所（设财厅前），南京分发行所（设花牌楼），济南分发行所（设商埠纬二路）等。

自一九三二年冬，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前，“神州”大部分编辑人员和一部分特约编辑，均先恬相率入闽，定期刊物亦宣告停刊，仅留少数人员维持现状。不久，福建人民政府失

败，外地分发行所即被蒋介石查封，存书被焚，从业人员纷纷作鸟兽散。总发行所因在上海租界，尚得保存下来，但结果仍与艺华电影厂、良友图书公司一起被蓝衣社暴徒捣毁，损失甚巨。“神州”从此进入了一个非常艰苦的时代。

从一九三四年起，“神州”留下来的人员，因政治上无保障，经济上也极度困难，故又继续遣散一批。由于经济力的支绌，编辑力量大部丧失，已无力量出版新书，只有廉价销售原来“神州”留下的书画册，维持职工的生活费。后来经理程葆元，把整个业务委托李朴生经营，自己去另寻出路。由于李亦不善经营，不久又闹亏空，接着也辞职走了。

一九三五年由方天白继任经理，在方任职期中，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日亟，蒋介石政权的魔掌已伸入上海租界，书书印行已受更大的限制。“神州”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出版了一部由程演生、李季、王独清等人合编的《中国内乱外祸丛书》，全书达四十册，共三百种，中有：《大金吊伐录》、《遯戎夜话》、《南渡录》、《甲申传信录》、《弘光实录》、《客滇述》、《扬州十日记》、《东南记事》、《倭寇事变》、《东林始末》、《三湘从事录》等编。

李季在《倭寇事变》的序文中，曾引证秦桧的“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一语来揭露当时胡适首倡的划北平为不驻兵的“文化城”，说：“就是等于说‘关外自关外，关内自关内’，而冠以荒唐的文化城为缓冲，是祖述秦桧。”不难看出“神州”当时出版这部书的用意所在。

这时“神州”的印刷所已出卖了。上述所出丛书虽有销路，但总的营业状况，仍极萧条。至抗战前夕，“神州”已进入到半生半死的瘫痪状态。

一九三八年，方天白以武汉已成为抗日的中心，故到汉口成立办事处，准备出版新书。他将上海业务交俞巴林负责主持。但以战局急转直下，武汉旋即失陷，沪汉之间的联系，又行中断。俞巴林为了维持自己和其他职工生活，只有利用堆存旧书的仓库，办小学来维持残局。

一九三九年六月，俞巴林与方天白取得联系后，又在韶关复业，继续出版新书。时以“神州”已无社会地位，故以“新文化出版社”、“言行出版社”名义出版。后因遭受敌机轰炸，机关市民纷纷疏散，无法经营，中断了一年，没有营业。

一九四〇年俞巴林回上海后，又开始编辑新书，出有马克·吐温的《乞丐皇帝》（俞荻译）、狄更斯的《双城集》（许天虹译）、阿·托尔斯泰的《面包》（俞荻译）等书。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上海租界时，“神州”又遭到一次洗劫。从此在经济上、业务上完全陷入绝境。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神州”始恢复营业，并逐步得到好转。次年，我由重庆回上海时，发现“神州”仍在继续营业，并出版一些新书，如林英的《红色延安》、史沫特莱的《在游击战中》、聂绀弩的《未来的春》等等，还再版了一些早期印行的世界名著。其时，我对俞巴林并不认识，即派人前去了解。知俞确为方天白委托的人（俞原在“神州”任校对。）俞在相当长的艰苦岁月里，把这个累经破坏的“烂摊子”保存下来，已属难能可贵。并查核前所出版书籍，并没有“落水”文人的作品，也没有不健康的黄色的东西，

在那邪恶的世界中，尤为难得。从现在看来，当时的出版物还不能尽满人意，但俞本人主观上总还是向进步方面发展的。故我了解情况之后，仍继续交他经营，并正式委托他任经理，我从各方面给予支持。

上海解放前夕，“神州”利用种种条件，公开印行一些国民党政权可能允许出版的新书，并秘密印出大批在解放区流行的革命文献，准备迎接解放。由于时间仓卒，在紧急情况下排印，不免有错字、落字发生。解放后发现，即停止发行。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神州”开始了新的前景。我来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时，俞巴林不久来京，因老友翦伯赞先生的关怀，“神州”与“中国史学会”签订合同，印行他们所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同时还得到中央财政部长薄一波同志的大力支持，给“神州”在上海人民银行长期贷用流动资金的最惠条件，使它能够顺利完成出版任务。

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四年陆续出版的有：《义和团》一部（全四册）、《太平天国》一部（全八册）、《回民起义》一部（全四册）、《捻军》一部（全四册）、《戊戌政变》一部（全四册）。此外还有：《中朝关系一百年史》（一册，陈述编）、《太平天国史资料译丛》（一册，王崇武编）、《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一册，魏子初编）。

一九五三年我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号召，主动请求华东、上海党政领导，提前对“神州”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得到批准，把“神州”并入公私合营的上海新知识出版社（现该社又并入上海市人民教育出版社）。由“神州”保存下来的号称“传家宝”的珂罗版书画册十八箱，我已全部捐献国家，交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收存。

从此“神州”走完了它自己的历史道路，汇入到人民文化事业的大海，得到了“善终”，结束了它的五十四年的历史。

注：本文原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七辑。编者对文中个别字句有删节。